



在洛杉磯民眾歡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照片來源: Los Angeles Times Archive/UCLA

戰爭與追思



100 年前的這個月，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北美洲及英國至少有 1,800 名扶輪社員
於戰爭期間服役；
還有數百人任職紅十字會、
基督教青年會及各政府部門。
超過 50 位犧牲性命。
在停戰的 100 週年紀念日，
我們回顧《國際扶輪英文月刊》
曾經如何呈現這場戰爭。



撰文：Geoffrey Johnson

1914-15

「雖然戰爭已經舉世公認是從黑暗的過去傳承下來的血腥武器…(扶輪應該)發揮其影響力，在不訴諸戰爭的情況下，維持世界各國的和平。」

1914年6月，參加扶輪社國際協會第5屆年會將近1,300名的扶輪社員聚集在休士頓市立集會堂(Houston's Municipal Auditorium)，如此展現決心。《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在8月號刊登這篇全文183個字的宣言。可是在那之前，連鎖骨牌已經推倒。6月28日，年會結束後2天，一個名叫加佛里歐·普林西普 Gavrilo Princip 的19歲塞爾維亞裔的波士尼亞人，在塞拉耶佛刺殺了奧地利大公斐迪南 Franz Ferdinand 和他的夫人蘇菲 Sophie。8月4日，德國入侵比利時，不到幾個星期，德國與其盟友奧匈帝國已經與法國、英國、俄國及塞爾維亞開戰。全歐洲已經陷入一片黑暗。

隔著大西洋的屏障，起初美國的扶輪社員只有受到戰事間接的影響。在休士頓年會時，一位名叫杜夫 R.C. Duff 的德州扶輪社員精準道出美國大多數扶輪社員未來至少一年的心情。杜夫讚揚工商業——「可敬、活躍、致富的商業、貿易、及工業」——乃是「戰爭的萬靈丹」。在《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10月號，亞特蘭大(Atlanta)扶輪社的創社社員之一希克斯 L.D. Hicks 說了一句標語：「不談戰爭，談生意。」

這些採取隔岸觀火的立場的扶輪社員，反映出美國威爾遜總統的態度，後者在8月4日發出中立聲明。他在兩個星期後對國會的談話中說：「美國必須在實質上，以及名義上，都保持中立。我們必須在思想上，以及行動上，都維持不偏不倚。」美國的扶輪社員預期能遠遠看著「人類屠殺」的位置賦予他們一個特殊的角色。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扶輪社懇求道：「讓我們美國人做我們能做的。我們不可以選邊站。我們不可以干預。可是我們可以提高和平的呼聲，讓它穿透這場最無情戰爭的混亂。」

扶輪應倡議和平的呼聲也來自組織之外。

在9月份對休士頓(Houston)扶輪社的演講中，作家兼出版商艾爾伯特·哈伯德 Elbert Hubbard 視扶輪為「全世界最偉大的商業組織」，並呼籲它「發揮它的強大影響力促進世界和平」。

1914年時，哈伯德在美國的聲譽少有人能及。留著蓬亂的頭髮，戴著寬大的牛仔帽、穿著鬆垮的外套、圍著長長的領巾的哈伯德，他的作品證明他完全不負他的名氣，包括精彩的月刊文章——最知名的就是《腓力士人》(The Philistine)，他的「抗議期刊」——以及他在紐約州水牛城附近開設的羅伊克羅夫特(Roycroft)藝術工藝社區所製作的產品。

1915年5月7日，哈伯德和太太愛麗絲搭乘的路西塔尼亞號(Lusitania)航行到愛爾蘭海岸附近時，被德國的魚雷擊中船頭。路西塔尼亞號在幾分鐘後沈沒，近1,200人喪生，包括哈伯德夫婦——來自密蘇里州聖約瑟夫的44歲種子批發商威廉·米契希爾 William Mitchelhill 也在其中。他所屬的扶輪社懷念他這個「人品高尚的人，尤其是他的友誼、慈善，及對人類的愛」。

路西塔尼亞號的沈沒讓美國人深刻感受到戰爭。1915年7月在舊金山舉辦的第6屆扶輪年會中，法蘭克·希金斯 Frank Higgins 掌握到這種心情的轉變。身為扶輪的副社長，希金斯同時也是加拿大卑詩省維多利亞(Victoria)扶輪社的社長。身為大英帝國的一部份，加拿大已經參與戰爭將近一年。希金斯悲哀說，這個世界在它的「文化、教育，及文雅的外殼」之下依然像過去一樣殘忍卑鄙。他說：「這點可從現在正在進行有史以來最血腥的戰爭這個事實獲得證實，人類彼此殘殺，就像黑暗時代的野蠻人一樣。」

希金斯害怕「和平與對全人類親善的教義會一直是遙不可及的事」——除非「有些提升的力量能注入這個世界。」他相信，扶輪就是「那個精神，那股力量…不斷擴張，持續強大。」

1916

雖然觀點持續改變，沒有在前線打仗的人努力理解這場戰爭。英格蘭一位扶輪社員在參觀



我們不可以選邊站。
我們不可以干預。
可是我們可以提高和平的呼聲，
讓它穿透這場最無情戰爭的混亂。



左上起順時針：斐迪南大公和他夫人的遺體莊嚴陳列；
一張插圖顯示路西塔尼亞號在愛爾蘭外海沈沒；美國的
綏靖主義者（包括左三的珍·亞當斯 Jane Addams）前往
參加一場國際會議；一位加拿大士兵在法國一處戰場
巡邏。

愛丁堡一座具戰略重要性的橋樑後，驚嘆「看到崗哨、有刺鐵絲網，及留槍眼的沙包牆，讓身在曼徹斯特的我們更切身體會到戰爭，看到（停泊在福斯灣 Firth of Forth 的）皇家海軍艦隊時也有同樣感受」。

7月1日，在法國西北部的索姆河 (Somme) 河畔，英國軍隊攻擊駐守在戰壕的德國軍隊。那天結束時，他們已經有5萬7,470人傷亡，包括1萬9,240名傷重不治的士兵。邱吉爾稱之為「英軍有史以來單日最嚴重的損失與傷亡」。

戰事在索姆河畔又持續140天，25個國家約350萬名男性參與其中。到了11月中，冬季氣候讓戰事中止，英國軍隊——包括澳洲、加拿大、印度、愛爾蘭，及蘇格蘭的軍隊——已經有42萬人傷亡；德軍至少有43萬人，法國20萬4,000人。陷入泥沼的戰事意味著軍隊每天的挺進與撤退往往是英寸、英尺，及碼來計算。

1916年11月，《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讀者得以意外窺視索姆河畔戰壕的樣貌。幾個星期前，多倫多 (Toronto) 扶輪社未來的社長喬治·布里格登 George Brigden 接獲一位名叫戴佛 F.G. Diver 的加拿大中尉來信。信函的日期註明是9月11日，開頭寫著：「收到我的信你無疑會很訝異，可是我覺得我想要以某種方式表達對你帶我進入扶輪的感謝之意，並讓你知道即使在遙遠的法國，身處前線的戰壕裡，我還是感受得到它的影響。」

戴佛接著解釋說，在英格蘭時與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個師聯防時，他是受命立刻前進法國，加入來自蒙特婁，俗稱加拿大菁英護衛的第87營的「幸運軍官之一」。因為不認識任何軍官，他發現「很難…打入他們的小圈圈」。有一次在戰事稍歇時，他走進另一名軍官的戰壕「抽根煙，並順便看看他褲子口袋有沒有東西暖暖身體，因為這裡早上四、五點時很冷。」

他後來發現這名軍官是里羅伊·蕭 H. LeRoy Shaw 少校，蒙特婁 (Montreal) 扶輪社的創社社員兼前社長。此外，如戴佛所發現，87營還有另外兩位軍官也是扶輪社員：厄文·雷克斯佛德 Irving P. Rexford 少校及約翰·路易斯 John N. Lewis 少校。戴佛解釋說：「從那個晚上之後，情況對我就大大不同，雖然我還不算融入他們的快樂小圈子，可是已經比沒有扶輪的關係時要接近許多。」

在寫下「祝扶輪安好」前，戴佛描述在戰壕裡的「美好生活」。「生活就像土裡的老鼠一樣，而且也跟老鼠一樣都沒換衣服…可是雖然有這麼多不方便，還是有事情讓你覺得很高興自己來到這裡。」





10月21日在中午過後不久，在索姆河的支流安克里河(Ancre River)東方開戰時，加拿大菁英護衛隊攻佔一個名為「皇后戰壕」的德國據點。領導該排士兵攻擊的戴佛不幸身亡。

4個星期後在離戴佛陣亡地北方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路易斯也遭逢同樣的命運。1874年生在田納西州，從芝加哥大學及海德堡大學畢業的路易斯曾在芝加哥一家報社工作，後來成為《蒙特婁憲報》(Montreal Star)的編輯。身為87營第一連位階第二高的軍官(僅次於蕭少校)，他曾因皇后戰壕一役的英勇行為獲得卓越服務獎章。11月18日破曉前不久，在大雨變成下雪之際，菁英護衛隊從淹水的戰壕爬出來，穿越敵人砲火跋涉過一塊泥濘無人佔領的土地到另一個德國據點，名為「渴望戰壕」。到了早上8點，護衛軍佔領這個據點，可是路易斯已性命垂危，或者根本已經身亡。

《蒙特婁憲報》刊登的訃文寫著創立當地童軍團的路易斯，無論是在芝加哥還是蒙特婁，都慷慨捐款給「特別照顧及協助兒童的慈善機構」。為了紀念路易斯，蒙特婁扶輪社募集1萬美元在魁北克省蕭橋男孩農場(Shawbridge Boys' Farm)興建一棟房舍，懸掛一塊銅製匾額，上頭刻著「最偉大的愛莫過於此，他為朋友奉獻生命」。(這棟兩層樓的磚造路易斯紀念館Lewis Memorial Cottage收容30名男孩，一直使用到1960年代。)至於蕭和雷克斯佛德，他們撐過戰爭，回到蒙特婁，蕭繼續從事他戰前的保險事業(以及他對冰壺的熱愛)，雷克斯佛德擔任扶輪社社長，並在1929年領導一項成功的活動，順利為男孩之家基金(Boys' Home Fund)募集超過25萬美元。

「我想要以某種方式表達對於你帶我進入扶輪的感謝之意，並讓你知道即使在遙遠的法國，身處前線的戰壕裡，我還是感受得到它的影響。」

——戴佛中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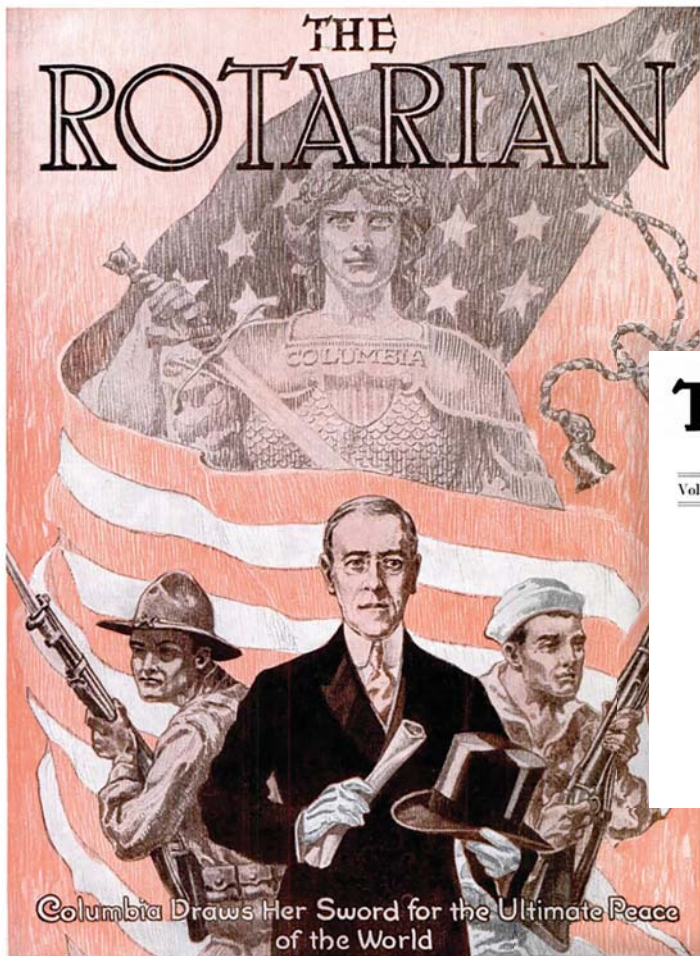
那一年還有一個扶輪相關人士喪生，哈利·勞德 Harry Lauder 的兒子在法國陣亡。身為一位「俏皮的」蘇格蘭人——這個經常與他名字擺在一起的形容詞表示一個幽默頑皮或狡詐的人——勞德是個辨識度很高的公眾人物，包括穿戴著蘇格蘭裙及寬頂圓扁帽，抽著短煙斗，拿著一支多節瘤的拐杖。他是歌手、作曲人、及喜劇演員，在英國、澳洲、加拿大、及美國各地歌舞雜耍表演劇場演出，場場爆滿，據他自己估計，他至少賣出100萬張唱片。在20世紀前20年，他是全球收入最高的藝人。

1914年底，格拉斯哥(Glasgow)扶輪社將勞德「再度」成

Vol. X. No. 5

MAY, 1917

Price 15 Cents



THE ROTARIAN

Official Organ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otary Clubs

Vol. XI No. 1

EDITORIAL

JULY 1917

Rotary's Greatest Opportunity to Serve

Inspiring Message from Paul P. Harris, Read at the Rotary Convention at Atlanta

Fellow Rotarians, Friends:

I hail you
I greet my brave
great majority
This is the hour

When the
calls, all material
assets in
rotic men. In
responding to
supreme pur-
portant occasion.
May wisdom



左上起順時針：兩旁是士兵，背後是憤怒的代表美國的哥倫比亞女神，威爾遜總統登上美國參戰後第一本《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封面；1917年4月2日，威爾遜要求國會宣戰；保羅·哈理斯在1917年亞特蘭大扶輪年會中「激勵人心的訊息」；扶輪社員，同時也是歌舞演員的哈利·勞德及他的兒子約翰。

為社員，雖然他宣稱那年稍早在美國巡演時已經加入扶輪。(扶輪內部傳說勞德在芝加哥表演時見過保羅·哈理斯，兩人還立刻成為朋友。)勞德經常熱衷於讚揚扶輪，也時常出現在扶輪社，引導社員唱歌，包括一首他編寫的歌曲，副歌是這麼唱的：「扶輪，扶輪，就是尋找友誼的所在。」

1916年聖誕節期間，勞德在倫敦一個劇場演出〈三場歡呼〉(Three Cheers)的時事諷刺劇，經常吸引從法國休假的士兵——就像勞德所解釋的，男人要找的是「輕鬆的、有漂亮女孩和歡樂曲子，而且會讓人開懷大笑的東西」。在新年的清晨，他客房的門鈴聲吵醒他。一位服務員交給他一則電報：4天前，大約早上8點，他25歲的兒子約翰——阿爾吉爾及南方高地軍團第8營的上尉——在法國小鎮波濟耶爾(Pozieres)附近被一名德國狙擊兵射殺。那時約翰·勞德正要休假返家。

我想要把雙臂探入黑暗的墳墓中，把我的孩子緊緊擁入懷中，親吻他。我想要謝謝他為他的國家、他的母親，以及我所付出的一切。」

——哈利·勞德

約翰的死讓美國的扶輪社員大受打擊。紐約市扶輪社送給他父親一篇由他們社員，作家兼編輯安姆伯格 F.D. Van Amburgh 所寫的悼念詞。《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在1917年2月號刊登這篇白話詩。這首詩的第三段寫著：「哈利，你看不見我們嗎？你不懂這不只是你的損失嗎？舉世同哀傷，出自扶輪社員內心最溫暖的撫慰。」

哈利·勞德在他的回憶錄《法國的巡迴歌手》(A Minstrel in France)中回憶兒子的死訊幾乎讓他終止演藝生涯，然而，他還是回去演出〈三場歡呼〉，強迫自己提供眾人擺脫悲慘戰爭的短暫喘息。1917年6月，他到法國慰勞英軍，士兵懇求他：「哈利，再讓我們大笑吧！」(勞德的戰時服務——包括募兵宣傳、醫院訪視、以及債券宣傳——讓他在1919年受封為騎士。)

在1917年的行程中，勞德到索姆戰場的兒子墳墓前悼念。(今天，歐維勒斯軍人公墓「Ovillers Military Cemetery」包含3,440名大英國協的陣亡軍人；超過70%都是無名塚。)勞德在兒子墳墓的白色十字架前哭倒在地。他寫道：「當我此時回首，我只能想到這個驅動且感動著我的渴望。我想要把雙臂探入黑暗的墳墓中，把我的孩子緊緊擁入懷中，親吻他。我想要謝謝他為他的國家、他的母親，以及我所付出的一切。」

1917年

1916年11月7日，在以「他讓我們避開戰爭」的口號競選後，威爾遜總統連任成功。1917年4月2日，在他就職後4個星期，他向召開特別會議的國會發表演說，要求對德國宣戰。不到幾天，眾議院和參議院都通過威爾遜的提案。

身為數個扶輪社的榮譽會員，威爾遜後來被《國際扶輪英文月刊》讚譽為「和平倡導者」。可是在德國人拒絕他介入協商終止戰爭的企圖，繼續無限制的潛水艇作戰，並策劃承諾墨西哥取回之前在美國西南部的領土引誘其加入戰爭之後，威爾遜已經忍無可忍。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支持總統。在5月號的社論中寫道：「在對全球民主人士的呼籲中，威爾遜總統很清楚擺在他們面前的是扶輪的超我服務原則——為全世界的服務——超過任何單一國家的利益。」在同一期雜誌中，一個裝飾著美國國旗的全版廣告以粗體標示「戰爭」的標題，意味著即將舉辦的年會中「出席年會有史以來最優秀的事業及專業人士，將給予美國總統更多支持。請務必來亞特蘭大，國際扶輪的歷史將寫下最偉大的篇章」。

重病無法出席年會的保羅·哈理斯，寫了一份訊息在會中朗讀。在其中他讚揚威爾遜總統——「美國公民的理想典範」——並樂觀看待對戰爭的潛在益處。他寫道：「此時是大好時機，此時有前所未有的機會——意想不到的機會。拋棄無用的過去，掌握有用的現在，此時正是空前的良機。人類必須從憂傷的深谷昂然起身，從痛

每個月的「扶輪社消息」專欄取消， 取而代之的是「忙碌推展愛國工作的扶輪社」及「扶輪社的戰爭服務」。

苦中讓高貴昇華。」

在這情況下，這份雜誌的走向也有決定性的轉變。每個月的「扶輪社消息」專欄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忙碌推展愛國工作的扶輪社」及「扶輪社的戰爭服務」。扶輪社員紛紛捐獻購買救護車及其他軍事用品，他們爭相競比捐款的金額。紐約州尤提卡 (Utica) 扶輪社社員在其「贏得戰爭」的活動中，購買了 33 萬美元的「自由公債」(註：美國在一次大戰期間發行來支持協約國軍事行動的債券)。

當然，《國際扶輪英文月刊》都持續報導這些民間計畫，尤其是大英帝國的部份。舉例來說，在 1915 年夏天，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 (Belfast) 扶輪社捐獻鉅額給當地的救護車基金。那年秋天，都柏林的扶輪社員「投入絕大部份的精力在娛樂受傷的士兵」。到了年底，安大略省漢彌爾頓的扶輪社員辦理「許多園遊會及其他公眾活動…來為前線士兵的需求募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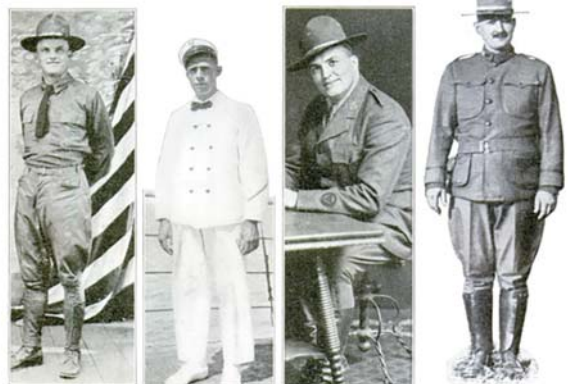
1917 年 9 月，訓練營活動委員會主委雷蒙·佛斯迪克 Raymond B. Fosdick 用戰爭部的信紙，寫了一封感謝函給《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編輯兼扶輪第一任秘書長 (雖然當時並未使用這個職稱) 伽斯立·裴利 Chesley Perry。佛斯迪克寫道：「貴組織所為令我大感佩服，我還向戰爭部長及總統報告此事。」之後威爾遜總統親自寫信給裴利，感謝「貴組織在國家危難時奉獻良多，我認為各位對眾人都由衷關心的目標有實質重大的貢獻」。

卓越的美國人姓名開始跟戰爭訊息一起出現在雜誌裡。李納德·伍德 Lenard Wood 少將撰文談論「新式美國陸軍」。美國食品委員會主委暨未來的總統賀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 宣揚「清空碗盤的福音」，簡述肉類、牛奶、脂肪、糖、及燃料的節省方法。他說：「打勝仗的方法就是停止浪費。」「美式足球之父」瓦特·坎普 Water Camp —— 在 1888 年到 1892



548 THE ROTARIAN —Vol. XI, No. 6

Some Rotarians on Active Service



Jack Craig Leo Weeks Dave C. Bayless Arthur Kemp
John E. Craig of Charleston, W. Va., at the Officers Reserve Training Camp at Fort Benjamin Harrison, near Indianapolis, in his best "Rotary Smile." Leo Weeks of Des Moines, chief boatwain's mate on Uncle Sam's "Dorotha." Rev. Dave C. Bayless, of Charleston, W. Va. is Y. M. C. A. secretary in charge of the work for the West Virginia troops at Camp Lee, Petersburg, Va. The boys call him the "Smile Captain." Arthur Kemp of the Buffalo Rotary Club, Colonel commanding the 74th New York Infantry, which was stationed at Spartanburg, S. C.

given. I long would be in Rotary; my membership reserves it! restore to me my

Here is a greeting to you, Al. ... From the boys down on the floor.

Clubs Busy at Patriotic Tasks

Activities of Rotarians naturally turn to those things the doing of which will help the Allies in the struggle for the freedom of the world

The dominant note of exalted patriotism and the earnest desire to render the most efficient patriotic service, that was sounded at the Atlanta Convention, was the reflection, in a fashion, of the same note that had been sounding in the local activities of the American Rotary clubs, and that undoubtedly will continue to be sounded in a far greater degree as a result of that convention.

In the placing of the Liberty Loan bonds, the clubs have had a considerable part. The following quotation from a letter written by Rotarian W. D. Biggers to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regarding the manner in which Detroit Rotarians worked on this proposition, is illustrative of the character of work performed by a great number of the Rotary clubs in the United States. Space limitations prevent the publication of the details of the work of all the clubs, but the activity of the Detroit boys is a splendid example of how they all performed such effective service. Rotarian Biggers writes:

Service, business efficiency, and salesmanship have again been exemplified in the recent canvass of the Detroit Rotary Club for the Liberty Loan.

Realizing that a full man's job was before us, the Liberty Loan Committee, with headquarters at the Detroit Board of Commerce, appointed team captains of "Liberty Loan Salesmen" to canvass the city. Seven of these captains were

and stands ready for the next call, whatever that may be.

Albany, N. Y.: The Rotary club has subscribed for \$1,000 of Liberty Bonds to be paid for out of the treasury funds. This is in addition to the subscriptions by individual members.

Alliance, Ohio: The Rotary club has a ten-acre potato field on the farm of Geo. Oyster just west of the city. The members know something now about the work entailed in growing potatoes. They went out to the farm to cut the seed and decided that potatoes for ten acres had enough eyes to see everything in creation. The task was turned into a frolic that caused everyone to ignore the sore and often cut fingers. A prize was offered for the Rotarian provoking the most mirth and Howard Boecker won it.

Champaign, Ill.: Cooperation in patriotic movements has featured the work of the Champaign club. This work has included: Observance of Independence Day under Rotary auspices, with Rotary president as presiding officer; a farewell by the club in a body to the 101 members of the second ambulance unit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which left July 1 for France; cooperation in the Liberty Bond campaign; work in the Red Cross campaign; the club subscribing \$100. No local units shall be permitted to leave for camp or for the front without a Rotary delegation being on hand to express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community, if the plan of the Rotary club is carried out. . . . Rotarian E. C. English is making a recor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ment aviation field in this county; Rotarian B. F. Harris is rendering service as vice-chairman of the Illinois Council of Defence.

年之間，他的耶魯隊的戰績是 67 勝 2 敗——談論他對「資深服務團」的想法，說明如何讓超過 45 歲的人「成為有效率的愛國者」。

戰爭主題的詩及激昂講稿也成為該雜誌的固定專題，刊登標題是「致法國！」、「漫長的戰役」或是「孩子從軍去」這樣的文學作品。它們的用意在提振士氣，可是也暗藏絕望的情緒。12 月，《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總編輯菲利普·凱勒 Philip R. Kellar 寫了一首「聖誕節的訊息」。開頭是這樣寫的：

喔！戰亂、殘酷、充滿仇恨的世界！

喔！無數戰爭犧牲者的血液

恣意染紅的世界…

謀殺、強奪、貪欲、欺瞞、謊言

肆無忌憚荼毒人類的世界！

這首詩的最後一段聽起來帶著一絲希望，可是仍無法消除陰鬱沮喪之情。就像他其他同胞，凱勒也警覺到即將來臨的大屠殺。

1915-18

1919 年 7 月，在終戰日的 8 個月後，《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刊登「金星榮譽名單」，列舉「奉獻生命服務國家及人類」的扶輪社員。名單包含 47 位扶輪社員的名字：其中 26 位來自美國，9 位來自加拿大，8 位來自蘇格蘭，4 位來自英格蘭——但至少還有 6 位成為榮譽名單遺珠的扶輪社員。（直到大戰後歐陸及澳洲才有扶輪社。）

理查·史迪西 Richard Steacie 上尉是第一個陣亡的扶輪社員。隸屬皇家蒙特婁第 14 軍，史迪西於 1915 年 4 月 22 日，在比利時西部的伊普爾第二次戰役中頸部中彈身亡。陣亡士兵的領章會標示他的位階及所屬軍團但沒有姓名，他埋葬的墓碑上刻著：「參與大戰的一位上尉…上帝知其名」。（史迪西的遺體在 2013 年終於辨識出身分。）

這份榮譽名單告訴我們關於韓德森 J.N. Henderson 的是他來自愛丁堡，可是在該鎮聖蓋爾斯大教堂裡的紀念碑指出他是皇家蘇格蘭第四軍的少校，於 1915 年 6 月 28 日在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島的古里峽谷戰役中陣亡。另外一位愛丁堡軍人，皇家



前頁左上起順時針：比利時一處因戰爭滿目瘡痍的景象；1917 年 8 月號的《國際扶輪英文月刊》詳述美國扶輪社「心心念念」想要「提供…愛國服務」；扶輪社慷慨捐獻購買救護車，像這些紅十字會的車輛；索姆河畔一處機關槍鎮守的駐點；響應從軍呼籲的 4 名美國扶輪社員。

蘇格蘭第5軍的騰布爾 W.E. Turnbull 中尉也死於加里波利半島。曼徹斯特第7營的二兵泰勒 C. Taylor 依然是個謎題；他不在1919年的榮譽名單，可是1915年12月號的《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有提到他的死訊。

並非從軍的每位扶輪社員都命喪沙場。密蘇里州約普林的攝影師羅伯·麥奎爾 Robert M. McGuire 於1918年7月4日因一場「讓他的身體符合從軍標準」的手術而身故。紐澤西州澤西市的喬治·布雷克斯里 George Blakeslee 於1918年10月2日在佛羅里達州強斯頓營區死於不明原因。紐約州金斯頓的法蘭克·基特 Frank Keator 於1917年12月29日在麻州的戴文斯營區死於肺炎。還有兩位扶輪社員也死於肺炎，而夸特馬斯特軍團的尤金·寇斯 Eugene H. Kothe 上尉於1918年10月14日，在華盛頓特區因全球的流感疫情而病逝。

停戰協議「意味著戰爭的結束，也是更盛大的和平戰役的開始」。

曾是卡拉馬祖學院美式足球明星中衛的約瑟夫·威斯尼吉 Joseph B. Westnedge 中校曾參與過美西戰爭，在墨西哥的龐丘·維拉 Pancho Villa 襲擊德州及新墨西哥州後駐守墨西哥邊境，並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率領知名的第32師「紅箭」的126步兵團，在法國參與數次大型攻擊。1918年11月29日，在法國南特一家醫院，威斯尼吉死於扁桃腺炎的併發症。他的名字不在榮譽名單之列。

對於扶輪社員來說，陣亡人數最多的時候是1918年美國軍隊抵達歐洲之後。大多數陣亡都發生在持續7週，打破德國最後一道防衛——興登堡防線的默茲-阿爾貢戰役 (Meuse-Argonne Campaign)。紐約州艾爾米拉的哈利·班特里 Harry B. Bentley 中尉於9月29日在聖奎丁運河附近陣亡；華盛頓州塔科馬的艾德華·羅德斯 Edward Rhodes 中尉則在近兩個星期後在葛藍德普瑞附近身故。今天，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在班特

里和羅德斯家鄉所在的州都有辦事處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

10月22日，德拉瓦州威明頓的二兵約伯·史比爾 Jacob Ferdinand Speer(他的名字也不在榮譽名單上)在法國南蒂盧瓦北方被轟炸夷為平地的馬德林農場附近陣亡。而11月4日，在戰爭結束前一個星期，內布拉斯加州林肯的豪爾德·布朗 Howard E. Brown 上校在進攻默茲河附近的村莊史丹奈時陣亡。身為最後一位已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亡的扶輪社員，布朗在身故前幾個星期曾寫信給倫敦扶輪社的社友，感謝他轉寄來「隔年的社員卡」。

可是布朗並不是最後一位往生者。這項殊榮屬於肯塔基州雷辛頓的葛里芬·寇奇藍 Griffin Cochran。《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忠實讀者可能記得寇奇藍的名字，因為大戰前他曾提供扶輪在他家鄉的最新進展。雜誌編輯解釋，身為扶輪特派員的他乃是許多「讓我們雜誌成功的服役者」之一。因為這句話出現在1916年，因此這裡提及的服役者並沒有軍事意涵，可是指配合當時《國際扶輪英文月刊》「雜誌服務」的口號而志願協助的扶輪社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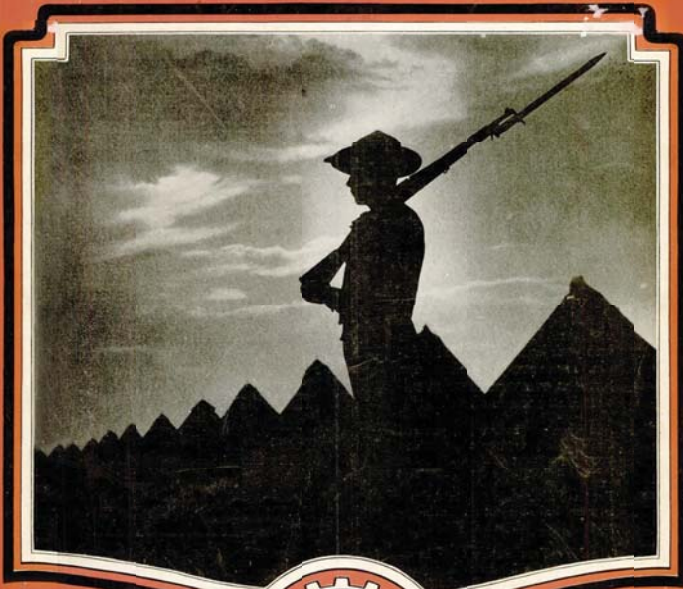
在1918年春天，寇奇藍在路易斯維爾附近的薩奇里泰勒營區擔任少尉。寇奇藍所屬的單位第309軍備運輸處最後也來到法國，直到戰爭結束後。1919年2月21日，寇奇藍在土爾斯身故，死因成謎。

11月11日11時

1918年4月，戰爭結束前幾個月，扶輪已經在預想戰爭後世界的局勢。那個月的《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刊登英國作家諾曼·安傑爾 Norman Angell 的文章，標題為〈民主和平的條件〉。在文中，日後於193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安傑爾支持威爾遜總統成立國際聯盟的呼籲。威爾遜總統從1916年開始籌劃推動這項計畫。

像威爾遜一樣，安傑爾知道他在打一場越來越艱困的戰爭。然而，他挑戰那些認為聯盟不切實際而心存懷疑的人。他辯稱：「事實上，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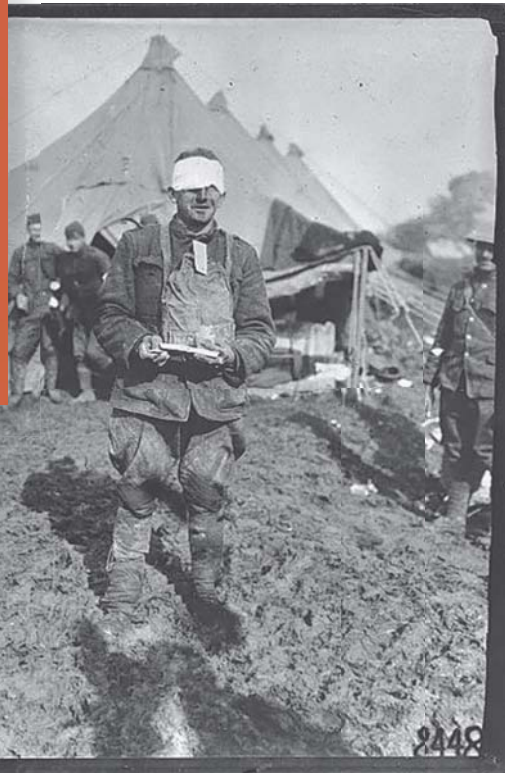
THE ROTARIAN



Conditions of a Democratic Peace
Rotary Ideals in the Trenches
Cometh the Concrete Ship



World Revolution Seen By Lincoln Steffens
The Religion of Democracy
The Man Who Beat the Germans



THE ROTARIAN

The Magazine of Service
The Registered U.S. Patent Office

Conditions of a Democratic Peace

By Norman Angell

BY WAY of classifying some of the issues with which we have to deal, may I make a confession of political faith with reference to the war?

I am an early adherent of American participation in the war, of the abandonment of American neutrality, on the ground that the outcome of the war would be more truly democratic if America were a participant than if she were not. Neutrality, in a war of this character, is an impossible position for a great people who want to take their part in organizing the world and making it safe.

I am not in favor of a "marched up" peace; I have never spoken a word in favor of an early peace, not because that is not important—we are not in a hurry—but because I believe that the peace which the war achieves are most important than the date at which it follows; I believe that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defeat and thereby discredit German militarism, and that until that condition is demonstrated the world will never be safe. And the war that America is waging to that end, a war in which she will obtain nothing that cannot equally be shared by all mankind, is an exceptionally inspiring, noble and hopeful spectacle.

Yet, dimly as I believe all that, I am also convinced that it is not enough, and that victory, whatever the efficiency and sacrifice of the soldier, will be impossible, or would finally be achieved on a material basis if it were possible, unless the civilian side has part in deciding the right policy.

Nothing that I shall say in that respect is proposed as a substitute for or an alternative to the active prosecution of the war, but as an aid thereto—an essential part of it, matters which we must consider if we are to wage war successfully.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

My thesis is very simple, almost a truism. Yet even so, that we are ignoring it.

In this: The survival of the Western democracy, then the effective use of their force, depends upon their being able to act as a unit, and maintain a unit after the war upon, that is, a degree of world internationalism. This unity may have not attained, even for the purpose of the war, because we have refused to recognize its necessary conditions.

group of states geographically contiguous and united politically and nationally by the predominant power of one member, we must achieve a unitarian equally efficient. In our case that can only come from the voluntary cooperation of equal—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

That unity is inseparable on the basis of the old politics, the European states of the past. For that system a condition of the world in which each state must look for its national security by its own handed strength, such may be based on hostility. The consequent competition for each territory inevitably brings even members of the same alliance, sooner or later, into conflict.

Norman Angell



The only possible satisfying alternative to this competitive tendency is the form of internationalism outlined by President Wilson: some permanent association of nations by which the safety of each shall be dependent upon the strength of the whole, the cooperation of all, the reciprocal obligation to defend one another. For such a policy to be operative each must have some measure of faith in it, must realize that the system will not end and a political reality of the future. So long as it is regarded as a dream, the old policy will be repeated by those who will be inevitably, and in a more dignified, the old competition for power, the deadly ferment of disintegration.

need; the old policy has in some measure been applied, and disintegration has set in.

We are not facing a vague possibility of the future, but actual and present danger. The failure to make the new policy a reality, and the application instead, in some measure, of the old, was perhaps the main cause of the German disaster so far suffered by the Allies—the defeat of Russia, the larger democracy of the future.

Chiliasm May Decide War

The President himself the other day that if the policy of the Allies towards Russia on the course of the Revolution had been somewhat different, if they had made a clear declaration of recent times, or firmly stated, Bolshevik and German forces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reach on British supplies so easily, and Russia might still be, if not fighting on the side of the Allies at least a better asset of the Allies instead of an asset of Germany.

The case involves a striking proof of the failure in which civilian policy may have been military cooperation, consequences measured in terms of whole armies and years of war, of the way in which civilian policy may add momentum to the soldier's battle, or lighten it.

So, because of merely military responsiveness would have prevented this disaster it might have made a war. If the actual new policy for shipment had reached Russia, we might be faced by the possibility of its actually being used against us. For victory depends not alone upon arms and munitions, but upon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guns shoot. And that depends upon policy, upon the civilian.

We have only to make a few more mistakes and we shall have made the situation with Russia to find the Great Alliance going to pieces, or after the war, and that would give the victory, ultimately, to Germany; however well our soldiers may have done their work.

Danger of Ultimate Failure

The danger of our ultimate failure, not from military but from political causes, hangs about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Allies, is a real one. The story of some military victories in France in France is that the results which might have been achieved by them have been nullified by the peace talks—generally by the dis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lliances have won the the military. And America might contribute to that situation.

左上起逆時針：1918年4月的《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封面刊登一位站哨的士兵，而在那一期英國作家諾曼·安傑爾展望戰後的和平世界。默茲-阿爾貢戰役的兩個景象：一家紅十字會醫院裡有一名受傷的步兵吃著巧克力和蛋糕；一支持槍的美國小隊朝德國戰壕據點匍匐前進。

ROTARIAN

U.S. Patent Office

Journal of Service

Nov. 1919

No. 1

How Peace Brings

R. Kellar

the Rotary principle of which must be answered in time. Certainly it instrument thru which to does not seem right to admit into such a league to service applicable as be- an unrepentant and unregenerate Germany. Out of Free Nations, or a of Germany there has come no word to indicate or a United States of that her people are sorry for the crimes they es of the World, or a have committed against civilization, against hon- It is conceivable that esty and decency, against justice and against God. So far as the rest of the world can perceive, the rmed and that it might German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crime which the chief st he

Another Call to Arms

A Message from President Poole

Washington, D. C.,
November 12, 1918.

Dear Rotarian Friends:

Victory is ours! The principles for which the Allies were fighting have been won, and there is occasion for great rejoicing.

This probably brings us to a point where, in the readjustment of things, many kinds of service must be rendered by men who are best fitted to promptly, intelligently, and unselfishly perform them.

The one outstanding organization whose membership is best qualified is Rotary.

Square yourselves, every one of you, to respond to the call with a firm resolve to do your utmost.

May I suggest that every club pledge its membership, in no mistaken terms, to do all it can, and do it with dispatch, when the call comes.

JOHN POOLE,
President, I. A. of R. C.

是因為我們不相信它才會不切實際。如果我們都相信它，決心付諸實行，這樣不僅會讓它切實可行，還會勢不可擋。」那麼扶輪戰前的「世界各國之間的和平」理想或許可以實現。

11月11日11時，在巴黎東北方47英里的康比涅森林(Forest of Compiègne)，德國代表與協約國司令費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會面並簽署停戰協議。扶輪社員興高采烈。菲利普·凱勒更樂觀，認為這場停戰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投降。它意味著戰爭的結束，也是更盛大的和平戰役的開始。」

「讓扶輪可行的事物，也同樣會讓各國的聯盟可行…瞭解、寬容、信心，以及——最重要的——服務他人。」

——哈伍德·霍爾

可是在停戰協議簽署前6天舉辦的期中選舉，共和黨控制了國會的參眾兩院。即使是能言善道的民主黨總統也無力回天。據耶魯大學的歷史學者約翰·布魯姆 John M. Blum 描述，不到幾個月，「戰爭期間的理想主義褪變為戰後時期的重重問題。通貨膨脹、失業，及對蘇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恐懼」——最後一項在《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文章中輕易可見——「降低大眾對和平及真正國際主義的熱忱。」美國國會不曾簽署凡爾賽和約，雖然後來國際聯盟成立，美國卻從來不是會員國。

即使威爾遜的夢想粉碎，扶輪社員仍想像可以自行建立一個跨國的聯盟。哈伍德·霍爾 Harwood Hull 在對波多黎各聖璜安(San Juan)扶輪社演講時表達這個構想。(霍爾的演講詞刊登在1919年12月號的《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中，標題為「扶輪的國際聯盟」。)霍爾說：「國際聯盟及它可能達成的成果對我來說都不過是一場夢、一個空想。讓扶輪可行的事物，也同樣會讓各國的聯盟可行——人與人的接觸、聯誼、友誼、瞭解、寬容、信心、以及——最重要的——服務他人。…」

「有朝一日，將會有一個扶輪的跨國聯盟。它可能不是我們現在聽到的聯盟，可是這個未來的聯盟要成功端看處理國際事務時扶輪原則被接納與應用的程度，如同人與人之間的往來也越來越需要這些原則一樣。」